

# 瓦窑堡：“人民共和国”的名字从这里响起

1935年10月中下旬，陕北延安的山坳坳里来了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此，中国的历史因他们而改写。

这一年秋天，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点”；之后，他们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当时的陕北“经济重镇”瓦窑堡，并于当年12月17日至25日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在这里更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在陕北延安市下属县级市子长市（原安定县）采访，处处感受着红色文化；瓦窑堡会议旧址，毛泽东、周恩来旧居，谢子长陵园，以及那些依然健在的革命见证人、老红军。

## 岂曰无衣 军民同心

1935年冬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踏进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家开创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时，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变局、大分化时期。“党内，思想尚未统一；党外，蒋介石顽固‘剿共’，数十万敌军大兵压境。特别是在华北，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步步紧逼。中华民族正经受着一场空前劫难。”陕西党史专家袁武振对记者说。

在这样一个矛盾极其尖锐复杂、局势诡谲难测的时期，党的领导者们果断抛开党派之见，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召开了在中国革命历史进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瓦窑堡会议。

“当年的瓦窑堡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而今被誉为中国革命的‘红都’。”据子长市瓦窑堡会议旧址管理处负责人回忆，当地曾有民谣：小小安定，人口四万，闹红共产，人人好汉。作为西北革命的“心脏”，子长市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个不足万户人家的山区小县城，就发生了大小战斗700余次，先后有3000多名子长儿女献身革命，其中有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400多人。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战乱、瘟疫、天灾等诸多因素制约，子长全市人口始终在4万上下徘徊。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人口增加到四十五万，改革开放的40年里，人口又增至二十六七万。”子长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说道。

红军初到瓦窑堡时正值寒冬，物资供给极度匮乏，指战员多是单衣草鞋，当地人伸出热情的双手，家家户户缝棉衣、做军鞋、捐钱粮、献牛羊，从各方面给予了党和红军最无私的帮助与奉献。雷兴平说：“仅1936年5月，西北军委办事处就向群众买粮2500担，借粮2000担，合计约18万斤。”在群众的支持下，党中央在瓦窑堡的七个半月，中央红军由不足万人发展到近3万人，革命形势焕然一新。

“革命成功了，现在吃穿不愁，安居乐业，太

幸福了。”今年97岁的老红军白成宝，家住瓦窑堡会议旧址附近。这个当时“个子还没有枪杆子高”的“红小鬼”，13岁参加陕北游击队，先后当过勤务兵和警卫员。如今他已儿孙满堂，在他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挂在窑洞墙上的“全家福”。“130多口的大家族，太有福气啦！”听了记者的话，老人轻声地说：“只有大家都幸福了，才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

“立根原在群众中”，依靠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这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未来的坚定指引。

## 统一战线 凝心聚力

瓦窑堡会议旧址坐落在瓦窑堡城内田家院内。冬日的午后，院子里静悄悄的，阳光斜射进当年的会议室，恍惚间，80多年前那场改变时局和国运的会议场景，浮现在记者眼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方不起眼的狭小天地里，擎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也促成了全民族的觉醒与团结。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毛泽东在瓦窑堡说——86年前，瓦窑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不久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从“工农”到

“人民”，两个字的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树起了旗帜，中华民族挺起脊梁，万众一心。

从此，中国共产党从陕北出发，一路向东，一直走到了天安门。

“会议最终决议要求党员必须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建森教授对记者说。

“这个决议的通过，证明中国共产党这支队伍的领导集体，已经在总结革命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成熟起来。”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小龙说。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我们党一以贯之，接续发展，推动建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对统一战线的时代意义给出了解答。

## 红色文化 网上地标

时光荏苒，瓦窑堡会议已经过去80多年，在党中央曾经战斗过的这块红色圣地上，革命前辈们留下了极其丰厚的红色文化遗产。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考察时强调要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陕西拥有包括延安宝塔在内的丰富革命文物遗存，国家公布的两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片区中，陕西涉及川陕、陕甘、长征、陕甘宁四个片区68个县(市、区)。”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介绍说。

“十三五”期间，陕西省共投入54亿元实施文物保护维修工程335项，完成革命旧址保护修缮和环境治理254处，修复可移动文物2.4万余件(组)。同时，全国唯一一个以红色革命资源为依托的示范区——陕西延安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示范区——陕西延安革命文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周魁英告诉记者，“5年来举办革命文物展览900余个，开展活动2400余场次，参观人数超8000万，大批展览引起强烈反响。”

近年来，陕西省围绕弘扬红色文旅着力开展数字创新。建设陕西革命文物大数据库，推动19家革命纪念馆实现线上展出；推进“延安革命旧址陈列数字化及互联网+展示提升项目”等。这些网络上的红色文化地标正在吸引更多的年轻一代了解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来源：光明网)

# 黄埔军校湘籍学员人数居全国之冠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第一个“结晶”。在黄埔军校的创办、招生和教学过程中，湖南共产党人态度积极、措施得力，参与人数众多、作出贡献极大。黄埔军校中的湘籍学员，居全国各省第一，涌现出许多军事、政治人才。

1924年3月6日晚上，一名22岁的湖南青年正在参加一场特殊的招生考试。考试的题目只有一道——试述投考军官学校的志愿。青年的名字叫蒋先云，他要报考的学校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此时的湖南，正处于军阀赵恒惕的统治之下，工人、农民运动被残酷镇压。蒋先云是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因此招生考试只能以秘密的方式进行。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决定筹办一所军事学校，在全国网罗人才，为革命培养可靠的军事力量。这年6月16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正式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

然而，想要顺利开展招生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国民党刚刚改组，还没有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网络。因此，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就在黄埔军校的招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地共产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在这个过程中，湖南共产党人作出的贡献极大。

刚刚在广州参加完国共合作会议的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和恽代英负责组织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工作。在湖南的招生工作则由共产党人何叔衡负责。在他们的发动下，一大批优秀湖南青年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报考这所军事学校。

中共湘区委选送蒋先云、陈赓、彭明治、袁仲贤、刘畴西、蔡熙熙、王尔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区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

琢、赵自选等一百多人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其中共产党员有50多名。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七个月后，他又以文武第一的成绩从黄埔军校毕业。

如果说蒋先云一个人“写就”的是一个“学霸”的传奇，那么第一期黄埔学生中大量的湖南人则印证了“惟楚有材”的事实。黄埔一期毕业生635人中，有湘籍学员182人，其中湘籍共产党员50多人，占黄埔一期共产党员的半数以上。

黄埔军校1930年9月停办，历时6年，一共办了七期。在中共湖南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下，湖南为黄埔军校输送了大量优质生源。黄埔军校总计8783名学员，其中湘籍学员有3473名，居全国各省第一。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培养了中国现代革命军队的第一批女兵，其中湖南籍女兵人数众多，曾宪植、谢冰莹、胡筠等都是第一批被录取的湖南女兵。

“黄埔军校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

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活动的开始。”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第二研究部部长朱柏林告诉记者，黄埔军校培养出了大量湖南籍军事人才，如左权、黄公略、段德昌、陈赓、许光达、陶铸、萧克等，他们通过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的锻炼和考验，积累了革命军事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为创建人民军队、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湖南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创建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在革命的哪个时期，我们总能看见湖南儿女活跃的身影，他们奋勇争先，舍生忘死，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寻找出路和希望。

蒋先云和另外两名校友陈赓、贺衷寒被称为“黄埔三杰”，他们三个均是湖南人。三人在黄埔军校期间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后来因为革命信仰不同，道路选择不同，最终的结果也大不相同。蒋先云是湖南新田人，位列“黄埔三杰”之首。廖仲恺称赞他是“军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才”。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蒋先云担任黄埔一期中共党支部书记一职，发展了80多名共产党员，还发起组织了广州地区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青年军人中的领袖人物。第二次北伐战争中，蒋先云担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兼党代表。在河南临颖与奉系军阀交战时，蒋先云不幸被炮弹弹片击中，壮烈牺牲。这颗黄埔最耀眼的明星就此陨落，年仅24岁。

陈赓出生于湖南湘乡，是“三杰”中名气最大的一位，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

贺衷寒是湖南岳阳人。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然而，后来他和革命渐行渐远，加入了国民党阵营，西安事变时获罪于蒋介石，自此再也沒有受到重用，长期郁郁寡欢，于1972年病逝于台湾。(来源：学习强国)

# 中国古代是如何植树造林的

先秦时期，《礼记》记载：“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早在先秦时期，就设有专门掌管国家山林的官员，此类官员称为“林衡”或“山虞”。山虞主要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对树木的栽种砍伐进行决策。林衡职位相对较低，受山虞领导，主要职责是巡视山林，执行禁令等。即使是在诸侯混战、四方割据的春秋战国，植树依然盛行。

在秦汉时期的壁画与画像石、画像砖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树木形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下令在道旁植树。《至言》记载：“秦为邓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树以青松”，可见当时植树之盛。西汉时期拥有很多树木的人，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比。

隋唐时期，隋炀帝虽留下万世骂名，但非常重视植树造林。他爱酷爱种柳树，曾诏令民间每种活一棵柳树，就赏细绢一匹。唐代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相当于现代的“自留地”。在永业田里必须种上一定数量的树木。唐朝还规定，凡驿站与驿站之间，都要种上道树。开元年间，还下令各地在通衢两旁都种上各种树木，以荫蔽行旅。

宋元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根据植树多少把百姓分成五等，并下令凡是垦荒植桑者，不缴田租。对率领百姓植树有功的官吏，可晋升一级。这就足见朝廷对种树的重视。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其中规定，每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可种榆、柳等。同时严防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失职或申报不实，按律治罪。

明清时代，植树规模有更大发展。明太祖朱元璋，人称“植树皇帝”。到朱元璋退位时，据说全国各地栽种树木达几亿枚之多。清朝前期，也要求地方官员劝谕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和牛羊践踏及盗窃之害。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提倡植新，光绪皇帝曾诏谕发展农林事业，兴办农林教育。(来源：佰佰安全网)

# 蔡伦与造纸术

蔡伦(约公元61~121年)，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今湖南耒阳)。公元102年，和帝皇后邓绥下令郡国进献纸墨。当时蔡伦出任尚方令负责御用器物的制造，能够随时随地接触到各地进贡纸张，为其改进造纸术提供了物质条件。不仅如此，蔡伦在掌管宫内文书档案过程中深感“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他决心造出比西汉更好的纸。

蔡伦改进造纸术，采用了多种植物原料，解决了造纸原料来源不足的问题。破麻布、麻头和破鱼网等废弃物，既增加了原料来源，又降低了成本，使纸张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多种原料的利用，对工艺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造纸技术的改革。根据史书中的零星记载，约略得知造纸过程，大概是经过灰渍、蒸煮、漂白几个阶段，先把原料洗涤后切断，经浸渍沤制，其间很可能已经采用加入石灰浆升温促烂和蒸煮等工序，再用力反复春捣，分离出纤维，制成纸浆，然后用帘子捞取纸浆，滤去水分、晾干，揭下来压平研光，一张新纸诞生了。这种纸，较之先前麻纸，更具柔韧性，耐折耐磨。

古代缂丝时，上等蚕茧用来抽丝，次茧用来制作丝绵。制作丝绵时，须用竹棍敲打浮在水面的竹篾席上的蚕茧。漂絮完毕，有一些残絮留在篾席上，形成一层薄膜，晾干后就成为一张薄薄的丝绵纸。这种纸是动物纤维的丝绵纸，是制作丝绵的副产品。

制麻的时候需要长时间沤。在水中浸泡，捶打麻，也会有一些麻残留在席子上，干燥后就成了麻质植物纤维的纸。上述两种方式，就是早期纸张的制作工艺，其成本过高，难以推广。而新原料的开辟和新技术的采用，使得造纸从纺织业中独立出来，这是造纸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从东汉以后，纸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蔡伦的另一造纸术贡献是皮纸制造工艺的探索和推广。皮纸是用树皮纤维制成的，其技术难度比麻纸更大。史料载“造意用树皮以为纸”的人，很有可能是蔡伦本人或其下属。他长期主管御用器物的制造，有条件会聚各种经验，博采众长，并组织推广造纸技术研究和造纸术。用树皮做造纸原料，是比麻纸工艺改进更重大的创造发明，开创了近代木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途径。

麻纸和皮纸是汉代以后中国纸的两大支柱，中华文明有赖这两大纸种的供应而得以迅速发展、繁衍、传播。造纸术的改进，使得人类梦寐以求的廉物美质书写材料终于诞生并迅速成长成熟，简牍和缣帛逐渐被历史所淘汰。公元3~4世纪，纸已基本取代了落后的简帛而成了我国主要的书写材料。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献纸于汉和帝，由于质量提高，得到和帝重视，受到和帝赞誉，并下令在全国推广使用。纸张的应用得以推广，逐渐代替了简帛。后人将蔡伦改进制造的纸称为“蔡侯纸”。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纸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它作为一种新的信息载体在中国最早出现，使得中国汉代的文明勃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别的文明。(来源：新浪网)

# 神枪手田万涛的故事

(接上期历史版)四

1942年深秋的一天上午，田万涛去响水口侦察时被伪军翟富部下认出，对其穷追不舍，准备活捉田万涛。田万涛凭借熟悉的地形一会儿甩开敌人，敌人仍然不死心，一路上挨门挨户搜查寻找。田万涛跑到丰大乡伪乡长潘学员(乳名潘小鹤)家门前，正好看见潘学员站在门口，便对潘学员说：“潘乡长，后面有敌人追我，我要躲你家，请给我行个方便。”

潘学员知道田万涛是神枪手，曾经亲眼见过他的本事。以前不相信人们传说他是神枪手，潘学员摆过“鸿门宴”，请田万涛来吃饭，田万涛赴约后见潘学员家锅不动瓢不响的。最终潘学员说请田万涛吃家养的鸽肉，让他打下站在房子上的鸽子，意在想试试这神枪手到底真是假，结果田万涛想打哪只就落地，弹不虚发。潘学员不敢得罪田万涛，对于田

万涛的请求只得点头同意。田万涛迅速上了二楼，二楼正是潘学员五女儿的闺房。五姑娘递给田万涛一支步枪，田万涛接过枪守住楼梯口，心想敌人谁要上来就打死谁。

这时，听到门口对话声：“潘乡长，您看到田万涛没？”“没看到啊。”“奇怪，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肯定跑不远！”“我真没有看到他，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去我家搜查啊。”

“不不不，潘乡长言重了，我们是绝对相信您的。走，我们去别的地方找。”

“进屋打麻将呢，在这玩玩吃过午饭再走。”

1943年底，滨海县县长王伯谦命令时任双港区游击队副队长田万涛逮捕早已叛变的潘学员。田万涛接到命令后，心里一愣，有点犹豫，潘学员曾救过他的命。但他转想一想，潘学员虽然救过自己的命，那是过去的事。他现在认贼作父，背叛了民族与人民，成了民族的败类，对敌人是不能仁慈的，必须坚决执行命令。于是，田万涛带领几名游击队员果断地抓获了已逃到毛野场(地名)的潘学员。后来，县委在上兴庄召开万人大会，宣判潘学员死刑，由田万涛对之执行枪决。

田万涛当时考虑到，潘学员曾救过自己的命现在亲手枪决他，潘学员知道一定会骂他，要死的人骂人骂不吉利！就在押解人员押着潘学员往前走出一公里之外，田万涛端起三八式步枪瞄准潘学员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只见潘学员的头一晃，接着整个身子瘫了下来……两个押解人员目瞪口呆。

呆，待回过神来都向田万涛伸出了大拇指。(供稿：刘金标)



图为田万涛夫妇和儿媳合影